

胡惠林论文化产业

Essays on Cultrual Industry by Hu Huilin



胡惠林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胡惠林论文化产业

Essays on Cultrual Industry by Hu Huilin



胡惠林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惠林论文化产业 / 胡惠林著. — 昆明: 云南
大学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482-2118-0

I. ①胡… II. ①胡… III. ①文化产业—文集 IV.
①G1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58466号

策划编辑: 陈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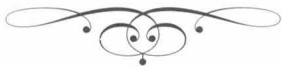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陈曦

责任校对: 严永欢

装帧设计: 庄海萌

胡惠林论文化产业

Essays on Cultrual Industry by Hu Huilin



胡惠林 著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8.5

字 数: 455千

版 次: 2015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2118-0

定 价: 68.00元

社 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电 话: (0871) 65033244 65031070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序

2012 年秋，惠林兄受政府之邀，到昆明市为干部培训班授课。其后的下午，我们在翠湖边小聚。喝茶闲聊的过程中，讲到出版方面的事，我建议他编一本论文集，把这些年来发表过的关于文化产业的论文汇集在一起，也是对他出版过的诸多著作的一个补充。惠林兄欣然同意。今年，惠林兄把整理好的书稿传给了我，并嘱我作序。事由我而起，只好于惶恐中从命。

惠林兄是国内知名的文化产业研究专家，是先期进入这一领域的学者。

早在 1998 年，在文化建设进入国家战略层面后，惠林兄就发表论文，提出要转变“文化增长方式”，要由传统的依附于政治、经济的功利需要的发展方式转变为具有独立品格的与政治、经济协调发展的方式^①，这可以说是倡导发展文化产业的前奏。1999 年，惠林兄主其事，文化部与上海交通大学共建的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成立，这是我国最早成立的文化产业专门研究机构之一。2002 年初，惠林兄与中国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的晓明兄、建刚兄共同主编的中国第一本文化产业蓝皮书出版。2003 年，我受惠林兄邀请，到上海交大参加“建立全国高校文化产业研究与学科建设联席会议可行性座谈会”，跟随惠林兄联络全国各高校中开始从事文化产业研究和教学的同仁。之后，我们共同编写了《文化产业概论》，供高校教学之用。这大概也是国内第一部文化产业专业的教材。一晃眼，也就十多年了。这十多年，也正是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产业发展历经风风雨雨、逐渐壮大的十多年。惠林兄按年代顺序编排起来的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反映了惠林兄致力于我国文化产业理论思维的逻辑展开，也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历程的理论见证。

惠林兄是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的专家，也可以说是文化产业发展研究的战略家。所谓战略家，就是站得高，看得远，不囿于局部的、眼前的视域，而

^① 见本书《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发展战略》。

总是从全局的、长远的格局和趋势来把握宏观的问题。因此，惠林兄的研究论题多偏重于战略研究方面，这从该书所收集的论文标题即可清楚看出。惠林兄认为，“当今社会，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发展与传播，已经到了不能脱离文化产业这样具体的文化存在方式去抽象地谈论文化的繁荣与发展的历史新阶段”^①。也就是说，文化产业的发展是文化繁荣与发展的必然形式与途径。另一方面，文化产业的发展又必须深深地植根于市场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大格局与历史趋势中。

我国文化产业的兴起，恰好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进程相伴随。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潮流中，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必然选择。而加入 WTO，则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合理而有利的渠道。这意味着不仅要开放经济商品的市场，而且要在一定程度上开放文化商品的市场，对长期以来习惯于在封闭环境中按计划自产自销的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于是思想文化界也有种种“狼来了”的惊恐和反对的言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惠林兄提出了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性设计。惠林兄认为，“发展文化产业并不是一般地满足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而且对一种新的战略资源的掌握，是对一种战略市场的争夺，是一种对新的文化存在的主导权的争夺”^②。这是战略家的眼光，也是在惠林兄的研究中反复强调的主题。“站在国家文化战略需求的高度，为新的国际文化战略竞争提供战略力量与合成形态，应当成为进一步深化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目标和战略价值取向。”^③

文化产业的发展与文化体制改革是密不可分的，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也就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文化体制，以释放文化生产力，激发文化创造力。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最明显的表征就是把经营性文化产业与公益性文化事业区分开来。对于这种区分，惠林兄的理论解读是“明显地表现出国家文化管理意志和管理政策的制度性重大转型。由于这一制度性重大转型的背后还广泛地涉及原有国家文化权力的转移和公民文化权力的实现，即各种社会力量

① 见本书第 64 页。

② 见本书第 65 页。

③ 见本书第 240 页、第 220 页。

更多地参与社会文化事务成为可能，从而使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主体的多元化共存，使得文化在很大的一个程度上、在更高的层面上回归了他的原生态”^①。从这里出发，惠林兄提出了他关于文化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这种调整包括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打破条块分割和行业壁垒、放松管制和市场准入等。^② 通观我国十多年文化产业的发展，这些问题确实是制约我们的重大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是在发展中才逐渐显露出来的，如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甚至小微企业严重缺乏问题（这实际也就是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的问题）；一些是一直想解决而未能解决的，如“三网”融合的问题等。由此可读出惠林兄的远见卓识。从战略家的角度，惠林兄并敏锐地预测到，大区域文化产业集群的崛起将深刻改变中国文化产业空间发展的力量结构，传统的文化产业发展模式和管理体制将在中国文化经济地理重构进程中发生根本性的转变^③；他更看到数字化对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并提出文化产业“数字话语权”问题。

惠林兄擅长于使用新的概念来揭示问题。除了上述“国家文化安全”“数字话语权”外，诸如“文化产业正义”“文化民权”“国家文化治理”等，都是惠林兄的首创。毫无疑问，这些概念的提出及其所包含的意义，对丰富、提高关于文化和文化产业的认识和发展，对丰富、提高关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认识和增强，都是非常有益的。囿于篇幅，我不能在此絮絮叨叨地复述，读者自会在其中读出惠林兄的一番深虑。

可能惠林兄站在发展战略的高度，对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属性看得比较重，因而对“创意产业”的提法并不认可——特别是把“创意产业”作为一个政策性概念。^④ 愚见以为，文化产业作为一个版权产业来看，并非都必然带有意识形态属性，很多版权产品、创意产品是与意识形态无涉的。特别传统的物质消费活动在今天越来越融入更多的精神因素，对这些创意产品的消费主要是涉及个人的文化修养和审美趣味。从发展的眼光看，创意产业是文化产业的必然延伸，它从传统的产业范围拓展出来，以其核心的创意向其他产业包括服务业、

① 见本书第 104 页。

② 见本书第 84 页。

③ 见本书第 261 页。

④ 见本书《对“创意产业”和“文化产业”作为政策性概念的思考》。



制造业、建筑业、农副产品业等等辐射，大大提升传统产品的文化附加值。这是一个极其广阔的市场，是发展文化产业或创意产业的巨大空间。“创意产业”与“文化产业”在概念外延上有诸多重合之处，但在其延展的内涵上不是“文化产业”所能全部清楚地揭示的。

为了完成惠林兄布置给我的这份作业，又囫圇吞枣把这部厚重的集子浏览了一遍，写出以上浅陋的文字，权作引玉之砖。

施惟达

2014年8月20日于云南大学东陆书院

目录

1998年

002 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发展战略

2000年

012 以创新为灵魂，构建国家文化产业体系

017 国家文化安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策论

2001年

038 关于WTO与我国文化产业创新体系问题的思考

2002年

054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趋势分析

060 要把文化产业作为意识形态建设来抓

063 在积极的发展中保障中国国家文化安全

2003年

078 文化产业：在市场经济中实现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083 论文化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与制度创新

090 关于文化产业研究在当代中国的发生

■ 2004年

- 098 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走出去”战略
- 103 论文化体制改革
- 120 中国文化产业进入战略发展新时期
——2004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几个特点
- 127 十六大论文化产业: 中国文化政策的重大发展

■ 2005年

- 132 区域文化产业战略与空间布局原则
- 154 文化制度创新的战略安排

■ 2006年

- 158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新阶段
- 164 论技术长波理论与文化产业成长周期

■ 2007年

- 184 中国的文化产业, 不能走“资源消耗型”和“环境污染型”的道路
——对当前“大片”现象的一种文化意见
- 190 文化资本: 现代文化产业和谐发展的能源形态
- 194 论文化产业的属性与规律

2008年

- 210 构建和谐世界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
- 232 应当树立文化产业发展的生态文明观
- 238 关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的思考
- 254 论文化产业发展与中国新文化变革

2009年

- 268 对“创意产业”和“文化产业”作为政策性概念的思考
- 272 文化产业的战略价值
- 277 文化产业正义：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地理学问题
——关于文化产业发展新战略理论思考
- 300 我国文化产业战略力量的发展方向
- 324 论文化产业的公共责任

2010年

- 340 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转型
- 344 再论文化产业正义：文化产权力与权利
- 362 文化民权：国家文化软实力建构的战略基础与价值取向

■ 2011年

372 当前中国文化战略发展的几个问题

389 构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低碳模式

■ 2012年

398 国家文化治理：发展文化产业的新维度

■ 2013年

410 掌握文化产业“数字话语权”

414 时间与空间文化经济学论纲

432 文化产业理性发展的尺度

——构建具有路标导向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标体系



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发展战略*

1995年9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说明》中郑重指出:“能否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关系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我们把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带入21世纪。”这是一个大国的最高决策者审时度势,站在民族兴衰、事业成败和全球发展的高度来指明本国文化建设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战略意义。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报告又进一步明确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全党必须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十五大报告用专门的篇章和较长的篇幅论述文化建设问题,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所罕见,而且把文化建设问题纳入今后百年党的基本纲领之中,这对于中华文化的建设与复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因而它是我们思考世纪之交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指导思想,是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文化纲领。

当代中国文化建设,首先面对的是:“国际范围各种精神文化力量的相互激荡和影响,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遇到严峻的考验。”

1993年夏,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就冷战后世界格局的走向发表了“文明的冲突”的观点。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后,新的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而是“文化上的”,在未来的世纪,“文明的因素将

* 本文原载1998年第10期《学术月刊》,1999年1月《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成为人类社会中一切冲突之源”，并断言，“下一次战争，如果有的话，那将是文明之间的战争”。在这篇名为《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的文章中，亨廷顿不仅将未来的世界文化形态概括为西方、儒家、日本、伊斯兰、印度教、斯拉夫—东正教、拉丁美洲、非洲等七八种主要文明的互动，而且直言不讳地将“儒家文明”视为引起未来文明冲突的主要力量，明确提出西方社会应联络其他文明形态对之加以遏制的全球文化战略。这是对中华文明的挑战，是对中华文化的挑战。

众所周知，亨廷顿并不是一位中国文化专家，但他绝不缺乏中国文化的一般常识。亨廷顿之所以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并非是它对历史的无知，而是他看到了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和只有二百多年建国史的美国文明之间的巨大文化落差，看到了无论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还是布热津斯基的“国家群体冲突论”面对冷战后世界格局所暴露出来的理论缺陷。在亨廷顿看来，意识形态和经济领域内东西方间的冲突谁胜谁负的问题，随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解体，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一种意识形态和经济形态的解体并不意味着一种文化的终结乃至消亡，尤其是当西方世界欢呼“共产主义大失败”的同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却作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新国家体制而迅速崛起。为什么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那样深重的灾难之后，中华民族能实现历史性的大转折？为什么经历了苏联、东欧剧变，国内政治风波，中国却出现改革发展的繁荣局面？在反思种种原因的同时，亨廷顿不能不看到五千年中华文明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文化力量。正如美国战略学家保罗·肯尼迪所说：“人们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忧虑，关键在于他们认为自身的种族和语言集团在历史上享有特殊地位，在世界文明中具有无与伦比的特点，对世界文明有贡献，因而必须使自己的人口持续增长，进而来保持自己的种族集团。”^①于是，站在“转变中的防卫环境及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一霸权主义文化立场上，亨廷顿提出了他的对策：推进西方文明内部，尤其欧洲与北美“子文明”之间的合作，促进与俄、日的合作，抑制儒教，亦即抑制中国。文明和文化的问题成为涉及国家屹立的重大问题。值得指出的是，这不只是亨廷顿个人的“文化战略”。

① 保罗·肯尼迪：《未雨绸缪——为21世纪作准备》，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页。



美国的另一位国策专家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失去控制：21 世纪前夕的全球性混乱》中，从另一角度发表了与亨廷顿几乎相同的看法；日本等国家领导人也积极响应。日本前首相桥本就说：如果各个文明不能实施宽容和调整的话，“文明的冲突将是可能的。”“文明的冲突”理论成为西方，特别是美国冷战后国际战略决策的理论向导，一种冷战后新的国际文化战略理论。美国实施的对华“知识产权战略”可以看作是这一文化战略理论的具体化。1997 年 7 月 1 日，美国公布了一份题为《全球网络贸易框架》的报告，提出“互联网络自由贸易区”的新概念。这是一个超越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的新概念。根据这一新概念，传统的关于自由贸易区的地域性将不复存在。美国将技术的边界视为它新的西部和传播美国精神的新天地。美国率先为互联网络自由贸易区确定规则，这是他运用文化手段，实施文化战略，推行国家扩展权力的新形式。由这些事例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世界范围内各种精神文化力量的激荡与竞争日益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主要形式。

正是在这样的国际文化背景下，世纪之交中国文化战略的制定被迅速地推到了全球各种文化力量相互激荡的国际文化关系的新格局之中。虽然，中国的文化现代化建设是一种根据本国国情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需要制约下的战略选择，但是，各种西方文化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渗透和影响，必然构成对 21 世纪中国文化发展选择的深刻挑战。因此，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战略制定，不仅关系到国际文化力量对比的调整，新的国际文化关系的重构和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建立，而且直接关系到 21 世纪中国文化的世界地位和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形象：也就是“把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带入 21 世纪”的重大问题。

二

正是在这新的时代课题面前，中共十五大高瞻远瞩做出了跨世纪的战略部署，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远大目标，确立了以邓小平理论这面光辉旗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向和根本原则。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在坚持这一方向和根本原则的前提下，建设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与政治体制相协调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文化形态及其文化增长机制。创造一种融民族文化性格和世界精神为一体的中华新文化。

首先实现文化价值观念转变和思维方式革命，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也是建制文化战略的基础。回顾历史，重构现代价值体系，始终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基本主题之一。在疾风骤雨的阶级斗争包括大规模的战争期间，由两极对抗而积淀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尺度，曾经是在我们相当长的时间内认识和判断国内外文化形势、决策中国文化战略和处理国际文化关系的价值坐标。其中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论”，就是在这一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创造，他为探寻和解决建设什么样的中国新文化，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作出了划时代贡献，为中国革命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实现了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革命性转变和重建，历史地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纲领。

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历史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以来，世界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冷战的结束标志着以两极对抗为特征的时代的结束，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世界正在向多极化方向发展。《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等全球性文件的签署，亚太经合会议和第一次亚欧会议的召开，都明示着：世界正逐步通过互补由对立走向对话，由对抗走向合作；西方的科学主义与东方的人文主义，不再仅仅是对立，而且更是融合与互补，从而形成超越了地缘界限的新的价值取向。尤其是当欧美各国深受权威主义和个人主义之害后，“第三种价值观”（儒家学说）所显示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新关系对“拯救”“衰退”中的欧美文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魅力。这种倾向再清晰不过地凸显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此外，从当今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形势看，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人类知识的形态、内容、传播和接受方式，“数字化革命”改变了我们用以记录和传播知识的符号，“数据库”的建立又使得人类知识面临空间的选择和重新构造，全球性互联网络的开通，使得任何文化封闭和阻截日益成为不可能。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计划与市场互向对方生成为全球多种文化共生和融合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文化空间，“世界迟早必须在地球上存在的各种伟大文明之间产生某种综合性的文明”正日益成为人们的一种普遍性共识。邓小平敏锐地洞察并准确地



把握住了这一全球发展走向，提出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具有突破性的“市场与计划”兼容理论，用三个“是否有利于”的标准，向传统的以两极对抗为特征的社会价值观中的姓“资”还是姓“社”的核心问题提出了挑战。这就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层面上，为中国文化发展的思维革命和价值取向注入了全新的内容。作为这一全新价值观在国际文化关系中的战略体现，1991年11月，江泽民首次提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该受到国家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左右的观点^①，超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差异发展国际新关系，建立国家新秩序，成为当代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新准则。意识形态可以不同，而文化却可以圆融；“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创造更加绚烂多彩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样一种以综合理性为特质的文化价值观，理应成为我们思考世纪之交中国文化发展战略选择的新价值观。只有在这样一种以博大的胸怀包容综合的新价值观的引导下，我们才可能在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的基础上，作出我们的文化贡献，才可能在新的文化世纪到来之前赢得相比较的文化优势。

三

提出和确立以综合理性为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新价值观，改变了以两极对抗思维为特征的文化定势。它要求21世纪的中国文化战略选择遵循如下的思路：变一元的国家文化主体文化为多元并存、多枝同根、多态同源、共生互动的新文化共同体。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提出、邓小平“一国两制”的创造性构想和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战略，都是向着新文化共同体迈出的坚实步伐。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主流文化不行。主流文化体现和引导着一国一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根本文化方向，规定着一国一民族的文化性质。这是文化的历

^① 1991年11月2日《人民日报》：《江泽民接受〈华盛顿时报〉原主编采访畅谈国际国内大事》。